

# 为了一部历史教科书型的中国藏书史

——《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 代序

徐 雁

在历史中国,中国藏书的发展史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历史社会的烙印。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无不影响于中国历史藏书的兴衰隆讫,而自然经济的历史变迁、文化学术的时代盛衰也无不同中国历史藏书发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中国历史藏书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社会生活的全面了解,也有助于学者对中国文化史的完整认识。正如现代史学家吴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09—1969)在1933年《江苏藏书家史略》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

除了中国藏书事业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历史社会的烙印外,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烙印。完全可以这样说,对中国历史藏书活动的从史实记录到編集总结、到专题研究的历史藏书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同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规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历史藏书事业毕竟是在中国历史社会的土壤里成长发展起来的,它不能不深深地打上中国历史文化的烙印。

然而无疑地,中国藏书史学研究方法发展进步的节奏是相当缓慢的。以中国封建藏书史而言,从《汉书·艺文志》序对周秦以来官府藏书历史的记叙开始,到《经籍会通》卷四对明代书业史料的结撰,中国古代藏书的史实记录的方法竟沿袭了整整十六个世纪!而作为经验科学的总结和藏书史料的編集的阶段又继续了从明季到晚清的近三百年,至于对中国历史藏书的专题研究则是以清末民初学者叶昌炽(字鞠裳,号缘毅,江苏长洲(今吴县)人,1849—1917)着手于他的巨著《藏书纪事诗》(1897年《灵鹫阁丛书》六卷本)的编撰为发端的。换言之,中国历史藏书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研究”还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此前约十九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藏书的史料工作几乎只有史料的积累、而无史论的突破;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飞跃,并没有从历史中国的经济、文化、学术背景上来考察各种历史事象同中国历史藏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列宁《卡尔·马克思》),其成果同发达的中国历史藏书、丰富的文献史料和历史藏书事业对文化学术史的巨大贡献等事实殊不相称。

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序言》)事实上,有了历史,也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载体——书。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在《知识的水库——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与保藏》一篇中这样叙述:“文字是记载人类思想活动的工具。人类文化进展到某一程度时,就得靠文字记载来保存活动的内容。当记载人类活动内容的文献,多到某一限度时,文献整理与保藏的问题也就跟著(着)产生。”(《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从而阐明了中国历史藏书活动发生发展的原始条件。至于“三代方策,退哉邈矣。”(《藏书纪事诗》王颂蔚序)“纪事多用竹木,纪功专用金石。”(《书林清话》卷一)说的无非都是上古时代文献记载的概况。历经诸子百家的争鸣、挟书之律的废除,中国历史藏书才进入了坎坷发展然而又是日益发达的历史轨道。然后,又是几百年过去了,纸张的发明,雕版的应用,使书业活动有了“笺素之约”和“刮削之便”(《文海披沙》卷四),中国历史藏书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阶段。从此,皇家藏书、私家藏书、书院

\* 《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由中华书局、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合作整理,系高等学校文献学、图书馆学、中国史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这是主编为这部书撰写的代序。

藏书作为中国历史藏书的三大系统，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途径地作用着中国封建历史文化的发展发达，同历史中国社会发生着更加千丝万缕的联系。

开展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如前所述，曾经历了一个长达三百年的编集总结的中介阶段。这是很必需的，因为前人长期的史实记录是一堆极其珍贵的遗产，蕴藏着尚未开发然而又是极其丰富的史料资源；而要对中国历史藏书的各个专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离开了它们，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史实记录往往存在不少缺陷，如梁启超在批评古代史书时所指出的那样：“……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因此，编集藏书史料的工作成为必要。

在近三百年的编集总结阶段，明清两代的学者们为我们贡献出了一些可资利用的文献，它们是张萱辑的《西园闻见录·藏书》，郑元庆、范锴同辑的《吴兴藏书录》，丁申编的《武林藏书录》等。当然藏书史料的编集工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并未因此而终结。在现代研究者的努力下，尚有《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李希泌、张叔华同编，1965年结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历代图书馆学名著选》（袁咏秋编，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国历代藏书家资料汇辑》（范凤书辑，1987年结集，稿本）、《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徐雁、谭华军整理，1987年结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至于本集《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也是在新的意义上对历史资料的整理、编撰。我们在这里举出这些成例只是想实证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明代以来，学者们在历史藏书学的方法论方面已经确立了一种可贵的“集中编纂史料”的思想。相对于过去长期的史实记录，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对藏书经验的总结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我们知道，随着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和书业活动的活跃以及随之而来的藏书事业的兴盛，关于藏书的学问日益为人们重视。尤其是经过北宋、南宋两代的藏书实践，藏书的意义已日益为帝王和士人重视，且在封建王朝政体内部、书院和士大夫阶层中间已经初步形成了“藏书传统”，在某些经济、教育、文化俱有条件的地区如北宋的四川、江西和南宋的浙江、福建的某些中心区域也业已形成一种“藏书风气”。这些因素，使皇家、书院、私家藏书事业已成为一种社会的事业。而同时，根据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藏书事业而言，“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古今典籍聚散考》第三卷第二章）伴随着藏书条件的大量具备和藏书活动的普遍活跃，有关藏书事业的图书访求、整理入藏、编目分类、庋藏保管、传承传播等“措理之术”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尽管祁承炘、孙庆增、丁雄飞和叶德辉撰写《淡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古欢社约》、《藏书十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向当时的藏书界宣传自己的藏书“措理之术”，但客观上这些总结藏书经验的著作流传所及，恰是传播了他们的藏书经验而对藏书事业发生有影响。以研究的眼光看，它们也必然分别吸取了明中叶、明季清初和晚清同时代的一些藏书家的经验而结撰成书的，因此是研究中国私家藏书的难得的实录。

此外，伴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发达，使记录着皇家、私家和书院藏书事实的各种“艺文志序”、“经籍志序”、“藏书记”、“书目序”、“藏书志序”等文献也在汉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大量产生。它们的代表作有：班固《汉书·艺文志》序、《隋书·经籍志》序、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张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后序等等，分别见于各代的正史、文集、方志、书目，具有面广、量大、针对性强的优点，从而为后世保存下关于藏书的历史概貌和具体资料，成为别一种的有效的史料积累，因而也是研究历史藏书的重要依据。

以上三个方面是近代和现代学者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史料资源。当然，也还有当日个别学者在历史藏书方面的论著在思想观点上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提供着启发。它们有郑樵的《校雠略》、曹溶的《流通古书约》、邱浚的《论图籍之储》、周永年的《儒藏说约》、刘音的《广儒藏说》等，成为研究封建藏书思想的珍贵资料。

经过这近三百年的史料编纂和史实总结，凭借着近十六个世纪史料的积累，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终于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时期。而肇其研究之端的，便是清末民初学者叶昌炽。

作为清季一位既有素养又有成就的学者，叶昌炽始终沐浴着江南人文圈的光辉。他生于素有“藏书之乡”美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因此深受“因士类显名于历代而人尚文”、“后生文词动师古昔”（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一引）这种文化环境和“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栋充栋、琳琅满目”（《苏州史话》第二十二篇引）这种藏书传统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便建立了对文献事业的爱好。出于对前辈藏书家尤其是乡先辈藏书家的敬慕，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和研究私家藏书的史料，并在前人著作体裁的影响下，创造了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著作体式，成为中国藏书史上的一部名著。

《藏书纪事诗》对上述三大史料堆的重视和开发是空前的。在关于自己扒梳史料方面的努力的一个回忆中，叶昌炽写道：“……窃不自揆，肄业所及，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见有藏家故实即哀而录之。”（《藏书纪事诗》七卷本自序）因此，近代学者汪闳评价道：“鞠裳先生撰《藏书纪事诗》七卷，网罗前闻、摭摭逸事、搜扬潜德，闾彰之功诚不朽矣！”（《明清蟬林辑传》自序）实际上，除蒐集扒梳史料、汇成专辑之外，叶氏用功至深的是对这些史料的利用。叶氏的“昌炽案”，包含着叶昌炽的历史藏书学思想和观点以及他研究雕版以来私家藏书史的成果，而这一切正是建筑在前人的史料记录和编集总结工作基础之上的。因此，《藏书纪事诗》贡献最大的地方，还不在于它作为一部专集本身多么地裨益于学术研究，而在于它对于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发创开先作用。在一篇关于藏书纪事诗的论文中，我曾这样写道：“……尤其可贵的是，《藏书纪事诗》为学术界开辟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发达的藏书历史、丰富的藏书史料，令近代学术界不得不为之关心瞩目。于是，作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的中国藏书史的研究，由于叶昌炽的努力，从此开始了。”（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5期）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距叶氏定稿七卷本（1910年）行世不到二十年，一个在对《藏书纪事诗》的研究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有关中国历史藏书方面的专题论著在这一、二十年不断涌现，蔚为有世以来的大观。其著名者就可举出洪有丰著的《清代藏书家考》（1926—1927年），蒋镜寰辑的《吴中先哲藏书考略》（1930年），聂光甫著的《山西藏书考》（1928年），张彬酥、查猛济合撰的《中国书史》（1931年），班书阁《书院藏书考》（1931年），汪闳的《蟬林辑传》和《明清蟬林辑传》（1931—1934年），杨立诚、金步瀛合编的《中国藏书家考略》（1932年），吴晗的《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1932—1933年），何多源的《广东藏书家考》（1933—1936年），伦明的《续藏书纪事诗》和《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1936年），陈登原的《天一阁藏书考》（1932年），项士元的《浙江藏书家考略》（1937年），李澍的《近世藏书家概略》（1937年）以及郭白阳的《闽藏书家考略》（稿本），袁同礼的《宋、元、明、清私家藏书概略》（论文），《藏书家尺牋》（影印本），《常、昭合志稿·藏书家》（方志，1930年），《图书学大辞典》（工具书，1940年）等等。但这些著述除少“旁通”、“会通”之作，几乎尽是私人藏书家的传记资料，囿于体例终未能于藏书家史实中考见出当日文化学术进退盛衰之迹。相比之下，《清代藏书楼发展史》（1935年）、《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年）便就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成为中国历史藏书研究史上的优秀作品。

可注意的是，以上所举这些著作，几乎都引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为其书的重要参考文献，而且在著述上呈依据已有研究成果推陈出新的可喜局面，这意味着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有序递进的历史阶段。如《藏书纪事诗》成为1932年结集的《两浙藏书家史略》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而《两浙藏书家史略》的研究成果又成为1937年撰成的《浙江藏书家考略》的重要依据。而1940年卢震京编集的《图书学大辞典》的藏书家传记词条更是广泛地参考和利用了近代学者在历史藏书方面的论著，成为中国历史藏书近代研究史上的一部集成果大成的著作。其在私家藏书研究方面的权威意义至今未没，因此两年前台湾又重印了这一部书。

这次研究运动是存在不少缺陷的。如前述及，三、四十年代的这些论著者在治学上缺少旁通和会通的思想，未能从中国历史藏书的兴衰中，研究出当日社会经济和文化学术的进退事实，更无论探讨中国历史藏书

的发展规律了。这是近代史学方法论尤其是历史藏书学方法论所造成的局限。此外,专题的研究缺乏精细全面的精神。一般说来,近代论著普遍存在研究过程粗糙和研究专题狭窄的缺点。这固然同研究伊始的客观条件不足有关,但也是近代学者学风不够严谨和方法论上存有缺陷所致。有成果可依的有序递进研究,一方面固然形成研究成果呈积累中递进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也带来了一些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如《藏书纪事诗》中“席鉴(玉照)”一篇“昌炽案”的误处(1891年),长期为《中国藏书家考略》、《常昭合志稿·藏书家》、《江苏藏书家小史》、《蟬林辑传》、《图书学大辞典》等沿袭引用,直到1949年丁祖荫、徐兆璋等重修《常昭合志》时才得到纠正(参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版)。因此,在这次历史藏书研究运动中并未出现能探讨中国历史藏书全面史实和发展规律的粗具历史教科书性质的中国藏书史著作来。

第二次中国历史藏书研究运动的契机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地新印古代藏书史料和重版近代藏书论著。在这一阶段,以当时在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后来的中华书局和在台北的艺术文书馆等出版单位贡献最丰。这时期的主要出版物有:《淡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吴兴藏书录》、《武林藏书录》、《流通古书约·古欢社约·藏书十约·藏书绝句》、《函宋楼藏书源流考》、《书林清话》(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经籍会通》(中华书局1958年版)、《广东藏书纪事诗》(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台北大华印书馆1968年影印本)、《藏书纪事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版)、《藏书纪事诗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清代藏书家考》(香港中山图书公司出版)等以及后来的《中国藏书家考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影印本)、《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等。但是极其遗憾,由于时政对学界的冲击,这一良好的契机在大陆和海岛两地均未及在现代研究者的努力下形成活跃的研究局面就夭折了。尽管时至今日,这些出版物还为研究中国历史藏书的当代学者们在资料上极大地仰仗着。

然而,当代学者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以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字椒微、曦樵,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1859—1935)的后裔、当代学者李希泌先生(同张椒华先生合作)于五、六十年代开始编纂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的正式出版(中华书局1982年版)为标志,一个方兴未艾的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运动正在开发利用现代出版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地掀起。从已经取得的成绩看,它更多地显示着的似仍是基础研究阶段的特征,前人做过的许多工作尚为大多数研究者所继承发展着。要全面评价目前已有的成果和进展是困难的,但我们不妨就现状指出如下的一些特征:

1. 旧史料的整理继续受到重视。尽管中国历史藏书的史料编集工作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史料的编集、总结和整理工作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的资料覆盖与中国历史藏书的丰富面相比仍不免失之单狭,尤其是对古人所大量记录的史料的蒐集更未开展。国内长期致力于该项工作的,有河南焦作市第二中学的范凤书先生。这是一位勤奋不倦的研究者,他以近二十年的努力编集的《中国历代私家藏书资料汇辑》稿本将近一百万字,如能出版,将是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有裨于私家藏书史的研究甚巨。《中国藏书家考略》经过近代学者俞鸿(运之)等校订近二百处、增加一百余人,使该书略臻完善,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正式出版。《藏书纪事诗》则业经现代学者、藏书家王大隆(字欣夫,江苏苏州人,1901—1966)先生增订甚多,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刊行;同时可能推出的将有北京图书馆马同俨先生的校注本,后者将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续补藏书纪事诗的整理工作,由北京大学学海社首倡,他们由1986年印刷的、由上海顾廷龙先生题签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作为《北京大学学海丛书》之一发行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吴则虞先生(字藻頔,安徽宣城人,1913—1977)的遗稿《续藏书纪事诗》(十二卷)已经整理成集,行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王睿先生(字佩净、号瓠叟,江苏吴县人,1888—1969)的遗稿《续补藏书纪事诗》(一卷)亦已由李希泌先生经手整理出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遗憾的只是择本不佳,印本错讹在一百处以上。至于根据《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校注增补的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合集本(《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续补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及其它一些藏书纪事诗)则定名为《续补藏书纪事诗传》与译本《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合集付梓。往往地,史料的大规模的汇编和整理,是一次活跃的研究高潮的充要条件。本集《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的编旨之一,就在于推波助澜,为高等学府的爱好者们提供一部足资浏览的优秀读本,吸引更多的人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

2. 专题研究工作充分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除了传统的皇家、私家、书院藏书三大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化外,许多论文的研究触角已深入到对佛藏、道藏、寺院藏书等领域,而征书、藏书题跋、藏书目录、藏

书思想、藏书保护、藏书流通、藏书史著作、藏书家个体史等专题也倍受重视。1982—1987年的大多数论文属于此类，但是蔚成专著的不多。有个别写成了专著也未正式出版，如钱亚新先生的《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仅有1981年江苏图书馆学会的内部铅印本；正式出版的就只有郑伟章、李万健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一种了。

3. 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方法论亟需改造纳新。目前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同志在方法论上尚处于袭用旧法阶段，表现为受传统束缚至深：用力至勤而成果不大；方法论上改造纳新的气象不明显，研究怀抱上呈闭锁状态。仅以研究专著的题名上，就可略窥一斑：范凤书先生对其编集的史料集的题名曾经考虑过四个以上，如《中国历代藏书家资料汇编》、《中国私人藏书史资料汇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考略》、《中国藏书家辞典》等等，同该书编旨、体例均不够切合。后经我提议，最后才确定为《中国历代私家藏书资料汇编》的现名。而苏州大学瞿冕良先生的关于江苏常熟这一藏书之乡所产的抄书家、刻书家（刻工）和藏书家的学术传记资料书的题名，则更为传统典雅：《琴川书史》。我无意于批评这种现象，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从题名的设计上可以看出学者研究思路上的因循。无疑地，研究上的集成、开拓和创新是当代史学的特征，也应该成为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方向。而集成、开拓、创新的成果的取得，首先有赖于研究怀抱上的开放涵容和研究方法论的改造纳新。一些论文的成功实践证明，数学统计方法、图表例示方法、模型方法、调查方法、黑箱方法、文化地理方法等可能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目前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引进和探索太少了。

4. 追求不高、自范不严，缺少以中国藏书史乃至专题史自任的研究者。众所周知，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更旺先生经年来致力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断代藏书史的论文，很见扎实的功底和谨严的学风。值得痛惜的是，这位专家在前年的不幸病逝，使我国学术界失去了编写出一部兼具中国藏书史雏形的、传统史著色彩浓郁的佳作的可能。我们赞许李先生那样的研究，专题论文应当具有明确的目论。而1982年由中华书局推出的一部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的许砾生先生编撰的《古代藏书史话》有二万二千字，实际上仅是中国藏书史的一部概而又简的通俗读物。拟于1987年正式出版的、作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用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谢灼华先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经过1986年10月的专家审稿会的反复推敲，在主编谢灼华先生率领的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下，虽仍存在某些不足，但更多的将是突破和特色。虽然这部书同我们理想中的《中国藏书史》距离还很远，但我衷心希望，这部书的公开出版能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起到指导和鼓舞的作用。

台湾学术界对中国藏书史、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也不够活跃。为台湾用作高等学府教科书（大学用书）的《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编，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再版）中关于中国古代藏书的一章文字（周骏富撰）十分概略也无特别创见，后收入《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王秋桂、王国良编，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初版）；而林庆彰先生为《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学术篇》（刘岱总编、林庆彰主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修订版）专撰的介绍我国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与保藏的《知识的水库》一篇长文的学术水平似也未出《中国图书馆简史》之上。在所知见的该方面的论著中，只有苏精先生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显示了博大精深的当代研究水平，因此是一种值得推荐的专著。①

### 三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自然辩证法》）无疑地，我国历史藏书事业的实践，贯穿着一种由朴到华、由简到繁的理论思维。因此，研究中国历史藏书除了要研究关于藏书的“措置之术”，即有关藏书的图书访求、整理入藏、编目分类、度藏保管、传承传播的事业发展史外，还要在广泛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背景上来研究在这些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的思维”。纵观近二千年、尤其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应用以来一千多年的封建藏书发展史，中国历史藏书学的发展是充分的，是无愧于立足中国学术之林的。

在谈到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地的问题时，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曾经这样指出：“各种科学的形成，每种科学所提出的问题，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乃是出于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需要、每个时代

所具有的知识能力。”“从某种程度看，科学的历史必须是目的论的，即是说必须归结于现代，因为问题在于从其发展中来理解现代。”（《地理学》序）然则中国历史藏书的发展历经1911年以后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和1949年以后的私家捐书活动，经过现代这四、五十年间的过渡在大陆本土业已形成三十多年的断层；历史中国关于藏书的“措置之术”对于当代图书馆的藏书事业既无直接借鉴作用，而历史藏书事业所依据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业已发生本质的变化，并无重大时代意义，那么，中国历史藏书还有什么研究价值呢？这个问题提得恰当。

对于这一疑问，我曾以一篇专论予以回答。<sup>②</sup>尽管经过近三年的研究，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点变化，但基本精神却仍是一致的：“古代藏书学的一切研究活动，是以编撰中国藏书史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弄清中国古代藏书的历史发展事实，总结古代藏书的优秀文化传统，介绍其文化学术史地位，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学总结价值所在。”兹将具体思想阐述如下：

### （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可为史学界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如果以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史研究的“直通”（精确而具体地划分中国历史社会的各个阶段并加以纵向研究）、“旁通”（将历史社会各阶段的各种现象有机联系起来的横向研究）、“会通”（对历史社会各个方面纵横结合的综合研究）的史学思想（参《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来检察中国历史藏书的具体研究，那么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薄弱是不言而喻的。即以在研究私家藏书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而言，仍存有许多缺点。有人就曾指出该书在“直通”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盖收藏之量愈富，措置之术愈精。学者于此，可见人文进展之迹焉。有清之迹叶昌炽著《藏书纪事诗》起自宋代，犹非穷本探原之笃论欤。”（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三）换言之，至少在私家藏书史方面，“穷本探原”的“直通”研究尚有大量的工作可做，更何况《藏书纪事诗》本身的收录还存有不少错误遗漏。〔详参《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叶昌炽《鞠裳》”篇所附辑资料〕至于关于皇家、书院藏书制度史，佛藏、道藏事业史，儒藏思想史等的研究更少为人重视，即研究断层极多，亟需接续。而从“旁通”、“会通”的要求而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更存有大片的空白，亟需弥补。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真是大有可为。这是因为，在历史中国，由于幅员的辽阔、自然的差异，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历史藏书事业发生、发展、发达的过程发生过极大的影响。这一些只有在广阔的中国史背景上予以综合研究，才能研深究透。而唯有通过如上这样的研究，才能弄清中国历史藏书的发展史实和规律，才能有助于后人对历史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了解，才能有助于学者对中国文化史的完整认识和历史文化规律的科学把握。因此，中国历史藏书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前途的。

### （二）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成果，可为文化学、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所借鉴。

如上所述，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同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存有密切的联系。那么，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势必要吸取以上诸史的研究成果，而它自身的研究成果又势必可为它们所借鉴。历史社会的各种事象之间本身是互为制约的，那么也只有通过对互为制约的各种事象进行“旁通”研究，才能完成综合研究。因而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对于文化学、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直接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历史藏书在功能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它是历史中国社会文化产品积累、传播和传承的重要系统。假如没有藏书家们日益自觉地从事收书、藏书、钞书、校书、借书、刻书的活动，那么我们如今很难继承有那么庞大的一笔文化遗产。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史义不容辞的重大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中国历史藏书的悠久发达在全世界各个国度中是独一无二的。藏书活动作为昔人一种臻于自觉的行为，它除了受经济、文化、政治的因素制约外，恐怕同地方历史的“藏书风气”和“藏书传统”有关。吴晗曾对这一文化现象作过这样的评论：“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形之隆浊为升沉枢纽，而以前辈导犁、流风辉映，后生争鸣、蔚成大观为之，点缀曼衍焉。”（《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因此，开展对历史藏书的研究，对于研究汉民族本土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具有重大意义。简之，则中国历史藏书事业发达、传统悠长、地方兴盛的事实，将为文化学的研究提供许多有力的实证；而具有历史教科书意义的《中国藏书史》的编成，必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章回之一！

### （三）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是总结爱书读书治学精神、光大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通过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创造、积累、传播和传承过程

中，历代藏书家的贡献是卓越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传人，藏书家们自觉地担负起了保护中国文化产品的责任，他们为此花费了巨大的劳力、财力和心力。他们对图书的爱护、对文化遗产的珍爱也是我们作为中国文化的当代传人和后来者所需继承发扬的。同时，藏书家在普通读书之外，更形成一种特色，他们关于读书、求书、鉴书、藏书、钞书、校书、跋书及其它与有关系的学问方法，不仅成为一种为历史所证明了的有效自学成才的手段，为许多读书人谨守不渝，而且早已笃成专学，为许多学者所致力研究。至于藏书家冷坐书城、刻苦研究、卒获成果的学术品质，更是值得当代研究者在精神上予以继承。爱书、读书和治学作为我们民族特有的一份精神遗产、中国文化独成的一种优秀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而具有历史教科书意义的《中国藏书史》也必须在包容了这一份内容的基础上，才堪称“形神兼备”，足传后世。

(四) 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是结撰历史教科书型的中国藏书史的需要。

所谓“历史教科书”型的史著，包含着如下三方面的结撰要求，即要求体例周密、内容详赡、精神显明，富于经典意义。它要求能垂则后世，成为后代学习历史的范本和有序研究的基石。换言之，它要兼备知识传播、历史教育和学术研究三方面的功能。《中国藏书史》应当以此自范。结撰中国藏书史，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藏书研究迄今未完成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如今虽有《古代藏书史话》、《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中国图书馆简史》一类书的编成问世，但其构架、内容、篇幅，研究所及的广度和所至的深度均同中国历史藏书的发达事实极难相称。我认为，只有全面系统地展开对中国历史藏书各专题的研究，在对历史藏书“直通”、“旁通”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编撰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初具历史教科书地位的《中国藏书史》来。

#### 四

时代的发展，已向我们提出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历史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1986年初，现代史学家田居俭先生在《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的代序中曾号召人们“再辟蹊径”，“从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高屋建瓴，穷目局部，从事各式各样专史和专题研究，特别是那些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的研究……。”

中国历史藏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无疑属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鼎足之下的”、“很少有人问津的”边缘地带，因此值得人们加以注意。因为，从中国历史而言，中国历史藏书是一门内蕴丰富但研究薄弱的专题史；从中国历史藏书自身的研究情况看，它还有许多课题亟待开拓和研究。服务于前述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现将当代研究亟需解决的主要课题分述如下：

(一) 清理史料堆，编集集文献大成的《中国历史藏书资料汇编》或《索引》。

日前，中国书史在台湾已有一部刘家壁先生主编的历史资料集《中国图书史资料集》(台北龙门书店1974年版)和王秋桂、王国良先生主编的当代论文集《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版)，而国内亦有历史资料集《中国古代图书学文选》(安徽师大图书馆1985年编)和当代论文集《中国书史参考文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0年编)编成，但均系非正式出版物。中国印刷史方面，已有魏隐儒先生著作的《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和台湾乔衍琯、张锦郎先生合编的当代论文集《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版)及《续编》。关于中国目录学的历史著作更多，著名者就可举出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和《中国目录学年表》等。历史资料集有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先生等编的《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当代论文集有赖茂生、李万健合编的《目录学论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简之，中国书史、中国印刷史和中国目录学史这三门同中国藏书史关系紧密的学科的史料清理工作，已井然有序、初见成效。在这方面中国历史藏书的史料堆尚是混沌散杂，尚未予以现代手段的清理。如张静庐先生编集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数巨册，本身是对近代图书、印刷、藏书、书业、报刊等大量论文资料的汇集，但由于在编例、入选等方面的不足，今天又亟需予以现代手段的清理。因此，现代手段的史料清理工作必须尽快予以补课。或者在选编《中国历史藏书资料汇编》的基础上编撰《中国历史藏书资料索引》，或者在编撰成《索引》的基础上再甄选《汇编》。两种方法互有联系，各有利弊，但大抵以后者为善，不过清理工程要更加浩大。

(二) 拓宽研究面，开展广泛的专题专史研究。

中国历史藏书专题专史研究方面的空白课题有：古代典籍的产生和传播；典籍聚散的地域性、时代性特征；封建王朝政治、文化、教育政策同皇家、私家、书院藏书的关系；书贾、书肆、书价、书源等同书业活动及其同历代藏书事业的关系；藏书家的古籍价值观和藏书风气、藏书传统；藏书保护技术和修复技术；历史藏书分类以及分类思想；藏书目录以及藏书家目录学思想；藏书题跋研究；历代书厄论研究；历代藏书观研究；历史藏书文献研究；藏书家关系研究；藏书思想研究；历史藏书价值评价标准研究；历史藏书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功能研究；历史藏书对中国学术史的贡献研究；断代藏书史和地方藏书史研究……，凡此种种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在中国历史藏书领域内的拓宽，尚谈不上更广泛意义上的拓宽。如对中国历史藏书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文化史的关系，中国历史藏书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世界史地位等等的研究，更是具有不竭的伟大意义的课题，需要倾注大量人力从事。唯其经过如此对内、对外研究面上的拓宽，具有历史教科书意义的《中国藏书史》的结撰才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 （三）排比史实线，积极编撰《中国藏书史大事年表》。

“大事年表”是一种以时代编年的方法来胪列历史事件的史学体裁，对于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发达轨迹和兴衰异化变迁过程提供着最为清晰的史实线索。对于一种历史事象，权威意义的《大事年表》和专史的编成，往往是其研究工作趋向成熟的标志。因为大事年表的编撰过程，也正是对史料堆进行多层次清理和开发的过程，往往需要博稽群籍、参互考订、反复论证、慎重结论。因此它既是一种集现有成果大成的总结工作，又是一个高强度、高难度、高密度的科研工作，其工程的精细浩大比之《中国历史藏书资料汇编》和《索永》将有大过之而无小不及。可喜的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系的一些同志在谢灼华教授的率领下，正知难而上，做着这方面的准备。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它、帮助它，使它初次问世的形象就能略臻完善，而且粗具权威意义。

### （四）积累成果层，致力结撰初具历史教科书型的中国藏书史。

关于结撰中国藏书史的问题，我在本序里讲得已经相当的多了。需要特别予以指出的是，根据学术界为其它历史事象结撰通史的情况来看，初具历史教科书性质的通史往往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修订——重版的过程；而且同时需要专题史研究的日益深化。范文澜先生关于专题史和通史的关系论述，对于《中国藏书史》的结撰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而从局部性到综合性的“反复”过程，正是积累成果层以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这种“反复”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而我国大陆和海岛至今尚无第一部中国藏书史的结撰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历史藏书尚未进入当代意义上的“积累成果层”的轨道。因而结撰一部初具历史教科书型的《中国藏书史》的工作是多么的迫切而又重要！

## 五

通过以上的论述，恐怕已不难了解到本集《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的整理宗旨。我们力图为结撰一部初具历史教科书意义的《中国藏书史》的工作贡献一点具体的成果，这是一；我们试图通过这个《读本》，吸引当代学者和后来学子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这是二；而以合作整理《读本》的成功，来宣示学术合作对于中国历史藏书研究工作的意义更是我们的初衷。服务于上述奋斗目标，我们在整理工作之初就广泛吸收了所专所长的同志参加，而整理者被授予整理的篇目，往往就是他们素常关心或研究过的部分；除了统一整理格式外，还进行了导读文字的反复讨论和相互修改；所有被采入《读本》的文献，都被告知以《导读》、《正篇》和《附录》这种统一格式加以编撰。并计划在全书完成后编制一个详尽的《人名室名书名术语索引》，不同于当前古籍整理通则的是，我们在校勘方式是“活校”，很少附有冗繁的“校勘记”；同时，对于文献中涉于历史中国藏书史实的名词、术语、事件未在具体篇章中一一作注以臻通俗，而是在首篇《中国历史藏书常识录》里作了统一集中的诠释。这是因为考虑到这个《读本》主要是供高等学校有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使用和学术界研究者们参考、凭藉的，因此我们不允许整理者对他们在专业文献的阅读上有任何的不信任。当然，这些尝试是否成功，尚需俟教学实践之后再予判明。我们认为，到那时或事修正似也未迟。

《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收录有《中国历史藏书常识录》(徐雁整理)、《书厄论十种》(徐雁整理)、《藏书论五种》(罗平、赵薇整理)、《浙西藏书录两种》(艾俊川、陈江峰、吴华整理)、《吴中藏书录两种》(瞿冕良、张杰整理)、《近三百年著名藏书家传》(谭华军整理)、《中国历代目录学家正传》(任德明整理)七种,提供了关于中国藏书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论点,还包括了江、浙地方藏书和近代藏书家、历代目录学家的基本资料。下册收录有《宋麟台故事》(姚伯岳整理)、《南宋馆阁录》(王燕均整理)、《南宋馆阁续录》(金英整理)、《元代秘书监志》(陈凡整理)、《明清藏书楼秘约》(徐雁整理)五种,提供的是关于宋、元、明、清四代皇家藏书或私家藏书制度的原始资料,内容包括有皇家藏书的沿革、建筑、典藏、利用、掌故、官制、权限和私家藏书的购置、鉴别、钞录、校讎、保护、编目、典藏等方面的基本史料。

上册部分的《中国历史藏书常识录》是整理者依据为编撰受约请的《文献学辞典》(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词条而积累的大量资料编写而成的。内容包括了“名词术语”、“历史事件”、“文献论著”和“研究课题”四个部分,笔者认为词条式的文献可起到“集成果之菁华、示学问以津途”的作用,因此诠释了二百个关于中国藏书史的词条。《书厄论十种》名曰“十种”,实际收录自隋以来历代学人记述和研究书厄事象的文献凡十四种。整理者认为,我国古代书厄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遭劫的一种征象,对它的研究“不能仅仅从中国书史,还要从整个封建政治史、文化思想史、科学技术史乃至中国藏书史的背景上加以综合的分析考察”。《藏书论五种》集录了明人邱浚的《论图籍之储》、张萱的《西园闻见录·藏书》、高濂的《论藏书》和清人周永年的《儒藏说》、刘音的《广儒藏说》五种藏书思想史方面的重要文献,是比较珍贵的研究资料。此外还有《浙西藏书录两种》,这是《吴兴藏书录》和《武林(杭州)藏书录》的合集;而《吴中藏书录两种》则是《琴川(常熟)书史》和《吴中藏书先哲考略》的合集。湖州、杭州、苏州、常熟是环抱太湖的历史上著名的“藏书之乡”,因此这四部书的集中整理,为我们研究江南地方藏书史提供了典型材料。至于《近三百年著名藏书家传》收录的是自1644年起到1949年以后三百余年三百多名藏书家的学术简历,《中国历代目录学家正传》则是公元前26年至公元1980年间四十六位目录学家的生平传记。下册部分有关于北宋国家藏书的实录的《麟台故事》,关于南宋的《中兴馆阁录》和《续录》,关于元代的《秘书监志》。这四部书在记载的历史时间上大体接续,因此是集中研究我国中世纪皇家藏书的重要文集。同时有《明清藏书楼秘约》,它们是明代祁承煜的《淡生堂藏书约》、曹溶的《流通古书约》、清代丁雄飞的《古欢社约》、孙庆增的《藏书纪要》和叶德辉的《藏书十约》。这几种文献尽管熟为人知,但一直缺乏对它们集中起来加以研究的权威之作。整理者认为,通过它们足以略窥中国私家藏书的堂奥。

同当代学术界的许多研究者一样,我们为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仅是沧海一粟。但是,“泰山之高,不辞土壤;沧海之大,不捐细流。”我们的努力,对于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大概总是有一点贡献的;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也正是一点一点具体的贡献,才使我们拥有了过去形成的内蕴丰富的史料堆、历史悠久的史实线,在近代建立的琳琅可观的成果层、广阔多维的研究面。假如没有前人这些不懈的努力、具体的贡献,我们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能取得如现在这样的一些成绩,将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我们自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的编撰的意义,首先在于《读本》整理的“群体合作”的方式。当今的台湾史学界在许多方面都已坚决地抛弃了学术研究“个体经营”的传统积习,许多学者无私无畏地走出了书斋、跨进讲堂,开始了史学研究“群体合作”的新纪元。这种做法表述了一种新的研究手段并预示着一新的学术方向。台湾许多合作群体的成功实践已向我们展示了其价值点和生命力。我们的《读本》也正是在台湾史学工作者的精神感召下着手组织、编集和整理的“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个别的尝试,而能日渐成为一种普遍自觉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衷心感谢《读本》的大部分整理者均曾服务过的北京大学学海社,是它以《北京大学学海丛书》(已故总顾问王力先生题签,1985年—1986年)编辑部的名义对本《读本》的各个子目作了积极的宣传并为整理工作提供了具体的帮助;同时还要特别感谢当时《学海丛书》的主编罗平、吴华学友的辛勤劳动。

根据美国著名史学方法论专家劳伦斯·沃克的理论,历史学者同另一门学科的结合,存在有一种互补与反馈的关系;如果一门学科对历史学无所赠予,那么它也不能从历史学中取得反馈性的补益。但“由于历史学本身是一门已经发展成成熟并基本定型的学科,因此从理论上讲,它可以同一切现成的或将要成熟的学科

(下转125页)

既清楚又全面地介绍‘脑科学(神经科学)’的书。国外有关神经科学的教材、专著、专集虽然不少,但内容太多,过于专门;也有较全面的普及性作品,但具体实验的内容又嫌太少。国内也有供生物学或医学专业用的神经生理学专著、小册子,但一般限于事实描述,而学术讨论方面则较欠缺。这一著作将实验成果、理论思维、发展简史、学术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具有突出的特点。”这既表明了作者在脑科学专业领域中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又表明了作者的理论素养的根基深厚。

四、《概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论、认识论的重要参考书。由于《概要》是在为哲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脑科学课程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形成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加深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研究为主要宗旨,着重论证和具体阐明脑科学发展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密切联系。作者在保持脑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的前提下,以相对独立的专题方式从两个方面作了具体阐述:一是通过阐明有关人脑及其基本组成单位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神经生理过程的基本知识和研究进展的状况,揭示出脑的整体活动的基础;二是根据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表现阐明人脑活动的神经机理和生化基础。这样既为加深研究意识提供了坚固的科学基础,又具体地揭示出脑科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作者

认为,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为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科学依据,而脑科学的发展又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指导。作者还指出,脑科学发展本身不仅提出种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会为唯心主义哲学的存在和活动提供地盘,并举出在脑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滋生出怀疑论或不可知论为例说明。因此,《概要》对著名脑科学家的哲学观点作了确切的评述,从而更具体地阐明了脑科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脑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整章的篇幅科学地揭示了人脑和电脑的联系和实质区别,概述了电脑产生的历史过程,说明电脑的实质和特殊功能,以及在科学发展和实际应用中的重大意义,驳斥了电脑可以超过人脑的唯心主义观点。

五、《概要》是国内脑科学园地中初生的第一部成果。毋庸讳言,《概要》虽然是脑科学园地中第一部与哲学理论结合较好的专业著作,但它也如同其他初生的新事物一样,不是完美无缺和完全成熟的著作,还有它的不足和薄弱之处,特别是随着脑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进展,它的不足和薄弱处会愈加表露,但这却是脑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共同前进和发展的杠杆。因而,这里无需赘述,大家读后自能分晓。(朱传荣)

(上接123页)

相结合。”中国历史藏书学的情况正是如此。正如前文所提示的那样,对中国历史藏书的当代研究已不仅仅是中国藏书史研究范畴的事,而且是历史学研究整个历史中国的迫切需要。唯其如此,才可能在广泛的历史科学的背景下结撰出一部初具历史教科书意义的《中国藏书史》来。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已给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赋予了新的使命,同时也给予了新的压力。我衷心希望,所有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同志们能置然奋起,勇敢改造和克服旧日研究中的不足和错误,带着负重般的使命感集结到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新的起跑道上!

注释:

- ① 台湾五年前尚出版有严文郁先生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台北枫城出版社),颇受海岛学术界好评。因迄今未见原本,故不列为评论对象。关于《近代藏书三十家》,详参徐雁《我国近代私家藏书的历史终结——论台湾传记文学版〈近代藏书三十家〉》,载《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4期。
- ② 见《我国古代藏书实践和藏书思想的历史总结——中国古代藏书学述略》一文,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